导　论

会计伦理学是会计学与伦理学的边缘学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伦理学或更确切地说是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故欲概括地论述会计伦理学,首先必须把握会计伦理学的涵义及其构成,而这又应先明确中西伦理文化背景下的现代伦理学的结构与分类。由此，也就构成了所谓导论部分。

一、中西伦理文化的简释

中西伦理文化的发展都可谓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但因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的不同,在发展的历史进程、内在逻辑和外在表征上,又有着较大的差异。因而考察和解析中西伦理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差异，无疑是认识和构建会计伦理学的重要前提。

(一)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简述

中国是一个以人伦道德文化彪炳于世的文明古国，伦理文化的发端最早可追溯至唐虞三代间,《易》、《诗》、《书》三经皆有其滥觞可供稽考。如《周易》就有"九五 甘节,吉,往有尚。上六 :苦节,贞凶,悔亡"[①] 等倡导节俭和守礼节的思想;《诗经》中也有"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②] 等人君为政,无强于得贤和用德垂范的观念;《尚书》里更有不少如"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① 《周易·节》。
② 《诗经·大雅·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章厥有常吉哉！’”① 的皋陶向禹提出从政者要具备九种品德之类的记载。而唐尧、虞舜、夏禹三帝原本就是中国上古时代的道德楷模。西周的周公旦则已开始制礼作乐，且在唐、虞、夏、商伦理萌芽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孝、爱、友、恭、信、惠”和“敬德保民”的道德规范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伦理文化的正式形成阶段。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对三代以来的伦理文化思想进行了总结，建立起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将孝悌、仁爱、忠信、智勇、宽恕、礼让等皆包容其中；“仁”几乎成了“全德之称”。而仁的基本内容，概括而言主要有四点：(1)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②。(2)孝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③(3)忠恕之道；“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④ (4)克己复礼；“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⑤ 除此而外，孔子还提出了处理义利关系的“君子义以为上”⑥为政以德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⑦ 中庸为最高道德标准的“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⑧；修身养性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⑨ 的诸多道德规范。孔子的这种以仁为核心，强调仁礼统一的伦理文化思想体系，被后来的孟、荀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加以了延伸和发展。孟子着重于仁，将仁与义相结合，提出了“不以仁政，不

① 《尚书·皋陶谟》。
② 《论语·颜渊》。
③ 《论语·学而》。
④ 《论语·卫灵公》。
⑤ 《论语·颜渊》。
⑥ 《论语·阳货》。
⑦ 《论语·颜渊》。
⑧ 《论语·雍也》。
⑨ 《论语·里仁》。

能平治天下'①;"辅世长民,莫如德'② 的仁政德治伦理观。荀子着重于礼,视礼为道德之最高原则和最高境界;"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谓道德之极'③ 提出了"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④ 的教化礼治的伦理观。这一时期除了儒家伦理文化的创立外,墨、法、道、农、名、阴阳、杂等诸家学派的伦理思想也纷纷登场。如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⑤ 的重功利和"强必富,不强必贫 强必荣,不强必辱'⑥ 的讲力行的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伦理观 管子的"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⑦ 和韩非子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⑧ 的强调法治的法家伦理观 老庄的"道法自然'⑨ 和"无为而无不为'⑩ 的崇尚自然、清静无为的道家伦理观等,都为我国古代伦理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奠基和推进作用。

秦汉隋唐时期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宗教化、玄学化和儒、道、佛三教伦理文化的鼎立与融合阶段。为总结秦亡教训和探寻长久治安之策,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从道德神启观念出发,吸收了汉初《仪礼》一书中的"君,至尊也;父,至尊也 夫,至尊也⑪ 的"三至尊"伦理思想和孔孟所提出的仁、智、勇、忠、孝、义、礼、信诸道德规范,在"天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⑫ 的天人感应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以"三纲五常"("三纲"

① 《孟子·离娄上》。
② 《孟子·公孙丑下》。
③ 《荀子·劝学》。
④ 《荀子·修身》。
⑤ 《墨子·兼爱下》。
⑥ 《墨子·非命下》。
⑦ 《管子·任法》。
⑧ 《韩非子·五蠹》。
⑨ 《老子》,第二十五章。
⑩ 《老子》,第三十七章。
⑪ 《仪礼·丧服》。
⑫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 "为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思想体系。而" 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 ;父为阳,子为阴 ;夫为阳,妻为阴 ";" 阳贵阴贱,天之制也 "①。五常亦比附于金、木、水、土、火的五行,两者都是天意的体现,是不能怀疑和违背的;"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②。正因为董仲舒的这种" 三纲五常 "的神学伦理有利于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精神专制统治, 因而得到了以汉武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的首肯和推行,开创了孔子神圣化、儒学宗教化的儒家伦理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主流的局面。到了汉末魏晋,先是道教的复兴,老子成为了道教的教主 后为反映门阀世族意识,以道家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的一种崇尚自然虚无、专致清谈思辨的玄学的盛行。玄学的开创者王弼提出了自然是本、名教是末;" 名教即自然 ";" 崇本以举其末 "③ 的观点;" 竹林七贤 "的阮籍、嵇康则更进一步反对" 三纲五常 "的名教,主张" 矜名任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 "④。佛教文化虽在东汉就已传入中国, 但到了魏晋通过与玄学的联手, 才站稳了脚跟, 并最终取代玄学。到了隋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四大宗派,天堂地狱、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虚无出世的佛教伦理逐渐成为了儒家伦理文化的神学补充。儒、道、佛三教文化既鼎立又合流的局面,为继之而来的宋明理学开启了先河。

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中国儒家伦理文化发展到最高的理学伦理文化阶段。所谓理学, 亦称道学, 是继承儒家孔孟的" 道统 ";广泛吸收道、佛的伦理文化成果而形成的具有庞大伦理思想体系的" 义理之学 ";开创于北宋的周敦颐,形成于二程(程颢、程

①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②董仲舒:《春秋繁露·对策》。
③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第三十八章。
④嵇康:《释私论》。

颐),集大成于南宋的朱熹。理学内部存在着不同派别,最主要的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南宋陆九渊、明代王阳明)心学,而程朱理学一直保持着正宗地位。所谓"理",周敦颐解释为:"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① 二程亦认为:"理即礼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② 到了朱熹则进一步明确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③ 由是观之,程朱之"理",实质上就是将"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道统发展成支配宇宙的精神本体而已。与此同时,理学在人性论上也进行了充分的发挥,二程认为,人性就是天理的体现;"性即理也",是"天命之性",即"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④。朱熹对此则作了系统的阐发:"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⑤;"性便是仁义礼智"⑥,天地之性即为"义理之性";在此基础上,程朱又引申出所谓的"理欲之辨",也就是"义利之辨",即"道心"和"人心"、"天理"和"人欲"、"义"和"利"的对立。所谓的"道心",就是"天理",是从天地之性出发的,是至善的;而"人心",是从气质之性出发的,可善亦可恶。故必须用"道心"来主宰"人心",人心才能由危而安,即二程所言的"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⑦、朱熹所言的"天理人欲,不容两立"⑧。为此要求人们必须"存天理,灭人欲",这正是程朱道德修养的最高宗旨,因"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⑨。只有采用"格物致知"、

①周敦颐:《通书·礼乐》。
② 《二程遗书》,卷五。
③ 《朱子文集·读大纪》。
④ 《二程遗书》,卷二十一下。
⑤ 《朱子文集·答郑子上书》。
⑥ 《朱子语类》,卷五。
⑦ 《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⑧ 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滕文公上注》。
⑨ 《朱子文集·与刘洪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居敬穷理”的修养方法,才能达到“心与理一”的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而陆王的“心学”,不同意宇宙人事的本体是“理”,只有“心”才是宇宙的本体和道德的本源,即陆九渊的“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①、王阳明的“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②。在义利问题上,陆王同样将两者对立起来,“利欲与道义,其势不两立”③。在道德修养上,陆王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去人欲而存天理”,只不过他们认为程朱的格物穷理是“外心以求理”,不是“求理于吾心”。故陆提出既不要读书也无须格物,只须“向内用功夫”去“发明本心”即可。王则进一步提出“省察克治”和“事上磨炼”的“致良知”的方法,强调“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④。与此相配合,王还提出了“知行合一”论,“‘知’即为良知;‘行’即为实行人伦道德,认为两者合不可分;‘知之真切笃行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不可离”⑤。由此可见,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然表面上说法不一,实施道德的具体途径上略有歧异,但在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⑥。由于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伦理文化发展到最成熟、最完备的阶段,同时也是开始走向僵化的时期,因而南宋的陈亮、叶适当时就反对朱熹等将理欲、义利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功利和道德是不可分的,宣称“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⑦自此以后,从明到清中后期,包括从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到戴震等一批注重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君为臣纲”,“存理灭欲”及其“空谈义理,不谈功利”等进行了

① 《象山全集·与李宰相书》。
② 《王文成公全书·与王纯甫》。
③ 《象山全集·与包敏道》。
④王阳明:《传习录》。
⑤王阳明:《传习录》。
⑥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象山学案按语》。
⑦ 陈传良:《致陈同甫书》。

多方面的批驳，为近代中国的伦理文化转折作了必要的准备。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封建伦理文化向资产阶级伦理文化过渡与发展阶段。前期“开风气”的人物有龚自珍、魏源等。他们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提出了“以实事程实功”的民族功利主义伦理思想。接着出现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康的整个伦理思想的基础即为去苦求乐的自然人性论，认为“日益思为求乐免苦之计，是为进化”①，并以“人”来对抗宋明理学的“理”，提出了“以人为主”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大同太平之世”的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以此批判封建专制的纲常名教，而“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道”的具体要求。严复的伦理观基本上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认为伦理道德不是先验于人的本性之中的东西，而是“物竞天择”规律作用的结果，指出道德和利益是统一的，只有“义利合”，才能使“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②，并强调“合理利己主义”和“民之自由”的重要性。而以章太炎、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则将矛头直指封建伦理道德。如章太炎在《民报》撰文：“三纲六纪，无益于民秋毫”③，宋明以来的理学只能压抑人的个性，是一种“以理杀人”的软刀子。并认为善恶“俱分进化”，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人伦道德都是不断前进发展的；“一切道德，皆始于自利”④。革命者应“知耻”、“重厚”、“耿介”，敢于为民请命；“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孙中山从他的民生观出发，认为道德来源于人类的“互助天性”，即“道德仁义，互助之用也”⑤。纲常名教特别是封建君权，把人“降为牛马”，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不堪忍受的，只有“人道主义”才是人类的福音。“自由、平等、博爱”是人道主义的“真髓”，而“三

①康有为：《大同书》。
②严复：《原富》按语。
③章太炎：《答梦庵》，载《民报》，第21号。
④《章太炎选集》，8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⑤《孙中山选集》，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民主义”本身就包含了自由、平等、博爱，两者“效力本属相通”。与此同时，他还主张发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道德”，这对于抵制列强的文化侵略，“恢复民族地位”是十分必要的。但对这些固有道德，孙中山都作了新的解释，如“忠”，不是“忠于皇帝”，而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因而他的这一主张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三民主义”的。他曾明确指出：“三民主义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义”①，因此，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就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体现。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结合，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才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西方伦理文化发展简述

西方伦理文化的历史发展一般可以划分为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又可统称为西方古典伦理学文化时期，集中表现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伦理系统的对立，并由此构成了二千多年的西方古典伦理文化发展流变的主要脉络。19 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第四阶段，又可称为西方现代伦理学文化时期，集中表现为现代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和现代经验主义（科学主义）两大伦理阵营，由此构成了现代西方伦理文化发展流变的主体。与此同时，宗教伦理文化在整个西方伦理文化发展史中始终与主流系统交织在一起，并占有一席之地。

古希腊人对伦理道德的思考，在《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统记》中就已见端倪。而早期希腊哲学的第一个唯物主义派别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从水是万物的本原或始基出发，倡导建立一种自尊和节制的伦理观。早期希腊哲学的唯心主义派别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从

①孙中山：《三民主义是造成新世界的工具》

“数”是万物的始基或本原出发,建立了和谐、秩序、正义的伦理概念,认为‘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全善和神一样’①。波希战争后,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希腊奴隶制达到了极盛时期。雅典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希腊哲学伦理的发展,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伦理体系。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派最早表现出经验伦理学的倾向,而更早则可上溯至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其是意志、激情和感性的沉醉的象征。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② 这一著名命题。他认为道德的主体是人,是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出的相互的约定,应以人的欲望、利益作为道德标准。与经验主义伦理观相对立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传统,最早则滥觞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其是人类最高光明、智慧、理性的超然体之本体象征。但真正的理论渊源则是古希腊哲学大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明确地把伦理道德作为哲学的研究目的,倡导‘认识你自己’,并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命题。将道德和知识合而为一,认为道德产生于知识,知识放在道德的首位,即以知识理性作为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从而开创了西方以人类智慧和理性为道德基础的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先河。德谟克利特从原子论的宇宙观出发,认为人的感情、欲望和理性都是原子运动的结果,由此建立起了灵魂宁静的快乐主义伦理观。而柏拉图则从宇宙的本原是精神性的理念出发,认为美德和知识都是理念的反映和再现。人的灵魂除了理性外,还有意志和情感,理性居于统率地位,相应地就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美德,从而第一个构建起了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性主义伦理学模式。为了调和他们

①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36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②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138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之间的对立冲突,亚里士多德从其‘第一哲学’中的实体说、四因说出发,提出了人既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行德,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知德,而美德就是一种适中或适度。“这个适度是理性原则所规定的,也就是有实践智慧的人,用理性所决定的。因此,就德性的本性或定义说,德性是一种适度或适中”①,从而形成了总结性的中庸伦理文化思想体系。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城邦迅速没落,历史进入了动荡不安和充满恐惧的‘希腊化’时期,于是希腊的文化和学术也进入了伦理学时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是继承了德谟克利特伦理思想的伊壁鸠鲁学派,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至善或最高理想是快乐和幸福,应以尽可能争取个人最大利益为目标来处理事物。另外就是坚持柏拉图伦理学模式的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幸福,而是品格、德性、律己、职责,应该用理性来断绝一切快乐和欲望,是一种禁欲主义伦理观。总之,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都重视智慧,认为正确的行动有赖于正确的思维……纯粹的快乐主义者及其反对者同样推重聪明、克己、勇敢和正直这些基本的德性’②。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在西方古典伦理学的发展中,宗教与道德始终渗透交融,原始基督教构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经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斯多葛派、罗马中后期的柏罗丁、西塞罗等人,希伯来宗教文化与古希腊哲学文化相互融合,至中世纪形成了西方传统宗教伦理学,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约翰启示录》成为了中世纪宗教伦理学的文化基础。早期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原则为爱、复仇、禁欲和来世。中世纪的教父奥古斯丁系统阐释了基

①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2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②梯利著,葛力译:《西方哲学史》,1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督教教义及其伦理思想,创立了原罪说和预定论,并概括出基督教三条道德原则,即信仰、仁爱和希望。被称为‘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安瑟伦,提出了‘先信仰后理解’的命题,认为信仰是理性和道德的源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救赎论的伦理思想和经院哲学,使哲学和伦理学都成为了神学的婢女。被称为‘天使博士’的阿奎那,认为人具有双重性,既有人性即尘世的德性,又有神性即神学的德性,尘世的幸福在于情欲服从理性,而人生的目的或最高幸福在于来世。他通过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奥古斯丁神学相折中,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经院哲学体系和神学伦理思想体系,使正统经院哲学走上了鼎盛同时也是开始衰落的时期。欧洲中世纪晚期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旗帜的反封建反神权的启蒙思想运动,崇尚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和享乐主义,反对神道主义、封建等级统治和禁欲主义,倡导人性至上、个人至上、理性至上,为后来的资产阶级伦理学的出现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文化思想虽然以人而不是以神为出发点,围绕人的本性、需要、利益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构建伦理体系,但仍未脱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相对立的窠臼。培根是17世纪英国近代经验主义的鼻祖,宣称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道德;“求知可以改进人的天性,而经验又可以改进知识本身”①。他提出了利人的品德就是善,社会善高于个人善的‘全体福利’说,从而奠定了近代经验伦理学的基础。霍布斯继承了培根的经验论传统,宣称公开的利己主义,具有功利主义的伦理倾向。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从经验论出发,指出‘人是善与恶、快乐与痛苦的混合物’②,人的本性是自爱,普遍道德律来自自然法,这种道德律可以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得到统一。著名的功利主义者边沁,

①培根著,何新译:《培根随笔选》,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②伏尔泰:《哲学通讯》,1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结了自洛克、休谟以来的功利主义观,创立了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标准即苦乐效用原则来进行道德评价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穆勒不同意边沁的苦乐只有量而无质的区别的观点,认为精神的快乐优于感官的快乐;"作为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作为一个满足的猪要好些"①,从而对功利主义伦理学作了重要的修正和补充。19世纪中叶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费尔巴哈从人的自然本质和利己性出发,断言:"什么东西阻碍我追求幸福的愿望,根本损害我的自私心和利己主义,它就不应当存在也不能存在"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追求幸福就是人生的目的的"合理利己主义"伦理观,从而使经验伦理学更具有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而近代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先驱17世纪法国的笛卡尔,从人的本性在于人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认为人要用理智去支配感情,作"感情的主人",伦理学"乃是一种最高尚、最完全的科学……它就是最高度的智慧"③,从而把道德的基础从神重新放回到人的理性上。荷兰的斯宾诺莎以道德上的至善——"人生圆满境界"的实现为出发点和核心,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认识自然的过程就是理性控制情感的过程,也是道德完善的过程,人的最高幸福就是求得至善。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人康德认为,伦理道德乃是一种先天的不依赖于经验的"实践理性",道德规律是一种无条件的、毫不计较功利得失的准则,即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律三大"绝对命令"。"如果理性必须先验地指定有一个最后目的,那么,这个最后目的只能是服从道德律的人"④,从而创立了一个以善良意志为核心,强调道德自律和至善的义务论伦理学体系。黑格尔的伦理思想基本可概

①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2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452页,北京,三联书店,1962。
③笛卡尔:《哲学原理》,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④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117~1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括为客观精神的‘抽象的法权’、‘道德’和‘社会伦理’三个发展阶段。他指出‘人惟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道德是自由意志对抽象法的扬弃结果;因此道德的意志是他人所不能过问的,人的价值应该按他的内部行为予以评估,所以道德的观点就是自为地存在的自由’① 而在‘社会伦理’阶段,他认为道德必须以社会国家生活为内容。他不仅区分了道德与伦理,而且还用辩证法论述了动机与效果、善与恶、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一套将伦理道德内容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联系起来的客观唯心主义伦理体系,成为近代理性主义伦理学的一座当之无愧的高峰。

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西方传统的古典伦理文化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从而开始了西方伦理学古典的终结与现代的转折,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伦理学分别向现代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和现代经验主义(科学主义)伦理学发生更新与嬗变。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德国唯意志伦理学和以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为代表的英国进化论伦理学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伦理思潮的起点。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发展脉络为:继德国唯意志伦理学之后的是法国居友和柏格森的生命伦理学,盛行于英美等国的新黑格尔主义伦理学和稍后的胡塞尔、舍勒、哈特曼的现象学价值伦理学。而最为典型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或人本主义伦理学流派则为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期的以基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伦理学和弗洛伊德、弗洛姆的精神分析伦理学。除此而外,美国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伦理学也具有一定影响。现代科学主义伦理学的发展脉络为:由于英国是经验主义的故乡,继进化论伦理学之后的是英国西季威克的公理直觉主义伦理学。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0世纪初英国的摩尔提出了价值论直觉主义伦理学理论，成为了现代西方逻辑经验主义即元伦理学的开端。继之而来的是普理查德、罗斯等人的新直觉主义伦理学，石里克、史蒂文森等人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和50年代以图尔闵、黑尔为代表的语言逻辑分析伦理学。与此同时，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现代经验主义伦理学相交织的是传统宗教伦理学向包括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和新正教伦理学的更新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西方伦理学进入了一个各种观点流派层出不穷的新发展阶段，但概而言之，不外乎为规范伦理学传统的回归（当代新功利主义和社会政治伦理学等）、科学技术伦理学（当代行为技术和自我实现伦理学等）、基督教伦理学（宗教存在主义和境遇伦理学等）三种基本发展趋向。

（三）中西伦理文化差异诠释

在对中西伦理文化差异的比较和诠释上，自严复、梁启超以来，陈独秀、李大钊、钱穆、黄建中、梁漱溟、张岱年、季羡林诸大师学者，都曾提出过鞭辟入里的见解。如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言道："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① 黄建中在《比较伦理学》一书中列举了"中西伦理相异之处有五：政治伦理与宗教伦理……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义务平等与权利平等……私德与公德……尚敬与尚爱。"② 张岱年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指出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有"：天人

①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言治季刊》，1918年7月。

② 黄建中：《比较伦理学》，83～9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合一与征服自然”“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协和万邦与征服世界”“和谐与斗争”四个方面。[①] 综合诸家观点，我们认为诠释中西伦理文化的差异必须从伦理文化的发展进程、内在逻辑和外在表征三个方面进行，方能以管窥豹。

1．中西伦理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方面

首先在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一条主线。唐虞三代至西周的伦理文化思想虽不能说是正式的儒家文化，但春秋战国孔孟创立的儒家伦理文化却以此为一脉传承的源头，孔子曾言“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就是最好的说明。儒家学派开创时期，虽然尚有墨、道、法、名等诸子百家与之争奇斗艳，但势头与影响均不能与儒家匹敌。至西汉，儒学被“独尊”后，遂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魏晋隋唐，道教复兴与佛学西来，但仍需与儒学结盟或交融，方能立住脚跟。而宋明理学虽说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结晶，但底色仍是儒学，实质上是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适当容纳吸收道佛文化的结果。近现代以降，虽有识之士振臂攘孔，痛斥儒家纲常名教，但潮落波平后，孔先生仍被请回文庙奉祀。如民主革命斗士严复、章太炎“改良”“革命”后，都复古尊孔，甚至连孙中山在高揭“三民主义”大旗的同时，也主张发扬“忠孝仁爱”等中国固有的儒家伦理道德；20世纪 80 年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思潮在海内外的流播与勃兴，说明儒家伦理文化思想至今仍不绝如缕。而在西方的伦理文化发展进程中，却没有哪家的伦理文化思想始终处子核心地位并一贯到底。虽然基督教伦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其毕竟是宗教，不是学派，且一直和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伦理学交织在一起，并未占有核心地位。

①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51～9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1990

其次在西方伦理文化发展进程中，前三阶段集中地表现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伦理系统的对立和论争，第四阶段则演化为现代非理性主义和现代经验主义两大伦理阵营。二元对立的伦理系统从古到今始终贯穿西方伦理文化的发展流变。而在中国的伦理文化发展进程中却始终没有形成二元对立的伦理系统。虽然春秋战国有诸子百家,隋唐有儒道佛,之间也形成一定的论争,但其论争是零星的、间断性的,皆未形成能与儒家伦理学派相抗衡的其他伦理学派。宋明的理学和心学之争,表面上看去酷似对立,但实质上只是儒家内部之争，而非儒家系统与非儒家系统之争。

最后在中国伦理文化发展进程中有一断层。“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思想渐人人心,新中国成立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伦理道德既不是封建儒家伦理道德,也不是资本主义伦理道德,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德和未来共产主义道德。而在西方伦理文化发展进程中只有转折，却无断层。作为学派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西方虽有所流行,但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构成西方伦理文化主体的仍是现代非理性主义和现代经验主义两大伦理系统的对立。

2. 中西伦理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方面

伦理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是指引导伦理文化不断前进的内部逻辑力量即基本精神思想。而这种基本精神思想本身也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对整个文化体系起主导作用的、关于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哲学思想。如何看待宇宙人生即自然和人的关系，中西哲学思想表现出大相径庭的态度。中国哲学是从人、人类社会出发,去体察自然,进而把自然人化。而西方哲学从自然本身出发,通过研究自然和自然的客观规律去把握自然。正如日本学者北聆吉所说的那样：“西洋之文化为求精神之自由,先倾其全力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东洋诸民族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与自然融合、

与自然游乐是也。'①

中国文化一直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持‘天人合一’的观点。这最早可在《周易》中见到有关记载，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②，‘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③，即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能在自然变化前对自然加以引导而不违背，也能在自然变化后遵循行事，故而是天人协调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④ 的天人相通的见解。汉代董仲舒又进一步创立‘天地万物一体’说，即‘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⑤。至宋代，经张载对‘天人合一’乃‘诚明’境界和程颢对‘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的立论，以及朱熹将其发挥为‘道在天地即是‘元亨利贞’四德(动植物发生发展的规律)，在人则为‘仁义礼智’，‘天人合一’这种关于人和自然关系、关于人生理想和人的最高觉悟、最高境界的宇宙人生观，达到了成熟完备阶段。

西方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却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立，在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持‘天人相分’的观点。其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被称为古希腊哲学之父的泰勒斯，将万物的本原看作是‘水’，认为万物由水产生，最后又复归于水，可见泰勒斯的哲学思想已直面自然，将世界对象化、客体化。而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两大著名命题，不仅从认识论上进一步拉开了人与自然的距离，认识到人作为主体与万物的对峙，而且也奠定了西方天人相分的哲学走向。以后无论是经验主义论者还是理性主义论者，都是将人同外在世界

① 转引自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言治季刊》，1918年 7月。
② 《周易大传·序卦》。
③《周易大传·文言》。
④ 《孟子·尽心》。
⑤ 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